

大学生论坛：数字人文拓宽越文化研究——记包弼德教授“用数字人文研究绍兴历史”讲座心得



11月2日下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查理斯·H·卡威尔”讲席教授包弼德教授访问我校，并作了“用数字人文研究绍兴的历史”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李圣华教授主持。

包弼德教授从数字人文的基本概念入手，阐明数字人文相较于传统人文更加充分地利用了数字资源，用计算性方法查找、提取和分析数据，把数据可视化，以创造新信息。包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简称CBDB）。他明确谈到，CBDB是关系型数据库，而不是人物传记辞典，它将零散的軼事有规律地整合起来，从而形成庞大的数据库。人物与其社会关系、住址等众多信息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系统的社会网络分析图，这为历史人物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又可靠的方法。此外，他截取部分人物的社会关系网络图与绍兴的某些历史变化图，直观说明CBDB在空间分析、统计分析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如：王守仁的人物关系图以及绍兴历代举人、进士的平均年龄等。

当大屏呈现出一张张信息网状图时，海量多元、关系清晰的数据图将浩瀚庞杂的信息可视化，将厚重的绍兴历史以直观的数字呈现在大众眼前，让人眼前一亮。这充分达到了包弼德教授等人研究数字人文的期许，即能为研究者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信息、进行海量数据分析提供便利。

包弼德教授作为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唐宋元明思想史、数字人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早在2019年，他便受邀参加了清华大学《数字人文》的创刊仪式，接受了相关采访，并在采访中提出了对于“数字人文”的看法。第一，数字人文是对传统人文研究的深入和拓宽，而非取而代之。第二，数字人文研究必须协同开展，比如CBDB的构建就运用到两种数据库——“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第三，当下的数字人文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对于研究者而言，如何进一步推进数据库的细量化处理，如何处理好数据研究成果与大众使用效率的关系，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作为正在从事数字人文领域积极实践，并试图借助数字人文拓宽越文化研究的大学生团队，我们仍需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探索。“数字人文”领域研究的机遇与困难并行，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任重而道远。包教授2019年的采访回答与本次讲座的内容对我们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使我们能够从中充分汲取到“数字人文”研究与越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并在收获中思考，在挑战中前行。

在包教授的启发下，笔者对利用数字人文技术拓宽越文化研究做出了五点思考：

其一，要打破固有理念，日日自新，与时俱进。“数字人文”是一项文理交叉的跨学科

创新型研究领域，其兴起绝非偶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目标，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逐渐成为人文研究领域新的热点。

基于此，在数字科技与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对传统的人文历史研究而言，搭乘数字技术的东风，也有利于其在新时代重焕活力。越地先人创造了远古文明，仅仅是越国古都，自建城至今，已经超过了2500年。历经几千年的沧海桑田，绍兴这块宝地孕育出辉煌灿烂、源远流长的越文化。数字文化兴起之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翻阅、检索并归纳传世典籍，传统研究者难以从宏观视角把握越地文化的整体性特征。随着新时代新技术的到来，古籍文献也期待着一个契机，在大众面前大放华彩。因此，我们需要转变固有观念，不囿于传统的研究方式，大胆开拓，利用科技力量为人文研究（包括越文化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其二，合理利用数字技术，探寻双赢道路，以科技力量赋能越文化研究。从空间层面来说，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越文化研究逐渐变得可视化、人性化。传统的“一对一”研究方式借助数字技术转型升级，发展成为“一对多”模式，交互性不断增强。譬如，为了继承鲁迅文学这一重要的精神符号，绍兴市连续十年举办文学论坛——“大师对话·鲁迅与世界文豪”。借助数字传媒工具，线下的学术讨论能够通过实时直播、新闻报道等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使更多人深入了解鲁迅文化，让鲁迅

精神在新时代跃动起来。在“大师对话”这一典型案例中，数字技术打破了文化传播壁垒，拉近了文化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理念做出的积极回应。

从时间层面来说，数字人文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越文化研究的效率。在现有的数字人文领域里，数字技术极大地发挥了其可编程性、自动化、高效性、精确性和可靠性等特质，为人文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成千上万的古籍经典得以借助数字资源进行储存，由此形成庞大的数字文献库，包弼德教授团队研发的CBDB数据库便为越文化研究省去了不必要的时间、资金、人力成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三，要勇于接受批评，及时修正错误，在合作中实现持恒发展。包弼德教授在讲座中提到，CBDB的建构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而是不断更迭升级的工程，他们将不断推进CBDB数据库的多维度优化，使CBDB的机制体制趋于完善。此外，包弼德教授与王宏魁先生还听取了在场观众就CBDB构建提出的意见，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与CBDB团队进行交流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包弼德教授提出，CBDB旨在收集文献里的事实陈述，但是通过深入研究，他们发现部分文献传记资料也存在不准确性、主观性过强，甚至带有偏见的情况。这就需要研究者注重文本的遴选，发现错误后及时追溯并修正。越文化研究也要坚持动态发展，不断进步。我们首先要做好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工作，使文献资料无限趋近全面、客观、真实、可靠，从而为数字化储存与使用提供便利性与准确性。同时，越文化研究绝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数字人文研究者若想以数字科技推动越文化发展，必须培养通力合作理念，彼此间戮力同心，赓续越文化发展。

其四，要迎难而上，灵活解决困难，养成学术研究的“强心脏”。CBDB数据库是包弼德教授与许多权威学者自1970年起潜心钻研的成果，庞大的网站数据背后是无数人的心血与精力。包弼德教授在2019年的采访中提及，除了技术方面的困难，资金问题也是一个大考验，但他们从未放弃，不断寻求合作，进行跨区域、跨国际的交流，最后成功搭建CBDB，实现了“给学者们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并且可以把中国的历史地名正确地映射在地理底图上”这一初衷。作为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团队，我们要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克服越文化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努力打造越文化研究的资料数据库平台，为越文化的传播、使用提供便利，并助推越文化不断地走向国门，走向世界。

其五，牢记初衷，以越文化内涵研究为重，以科技力量为辅。“数字人文”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文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在推动数字人文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对技术盲目崇拜，迷失研究方向。在使用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注重传统文本资料，始终将“数字人文是人文研究领域的拓宽发展而不是代替发展”铭记在心。不能空有华丽的数字衣冠，仍要秉持刻苦钻研的学者精神，努力思考学术问题。正如包弼德教授多次强调的那样，自己并非数字人文学者，而是历史学家。在享受数字技术对越文化研究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根据所得数据，自觉对越文化的人文历史与精神内核进行深入研究，不能忘记越文化的发展深深扎根在越地人文内涵的土壤里。

概而言之，“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不仅为越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工具、新方法，改变了以往越文化研究的范式，也提升了越文化的可视化和沟通效果，促进了越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跨界合作。数字化时代使得越文化研究可以依靠数据进行分析 and 推断，数据驱动的研究从数量化的角度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以及文化和社会的变迁范式。“数字人文”是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应有之义，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我们从本次专题讲座获知了CBDB数据库的高效便捷，以及“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这将激励我们进一步创新越文化的研究模式，向实现繁荣数字文化的目标不断迈进。

（作者：汉语言225曾幼玲，汉师213应睿，汉师221陈若璇，汉师221郇子涵；指导教师：方曙琴）



本文作者与包弼德教授的合影



# 宋六陵的兴建与祭典

●赵国光

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赵构定都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以卧龙山州治为行在。绍兴元年（1131），宋元祐太后孟氏（宋哲宗皇后）驾崩于卧龙山皇宫。奉太后遗诿就近择地攒殡，因宝山（今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形势天设，吉气丰盈，遂以攒官为名葬于宝山南麓，此为绍兴攒官之始。绍兴十二年（1142），迎徽宗灵柩葬于宝山，为永祐陵。后南宋历代皇帝崩殂和皇后去世，都攒殡于此。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宁宗永茂陵三陵并列。其南为光宗永崇陵、其北为理宗永穆陵。德祐元年（1275），宋度宗灵柩入葬陵区，为永绍陵。宋度宗是最后一位入陵的皇帝。宋六陵其实有“七帝”“七后”陵，因安葬南宋六个皇帝世称“宋六陵”。另外，宗室贵族、王公重臣陪葬墓亦甚多，有数百座陪葬墓。

宋六陵建造初衷是临时安置，待收复北方失地后，要归葬永安宋陵（今河南巩义）。随着时局推移，归葬无望，只得继续攒葬宝山。皇陵建筑大致沿袭北宋规制，虽没有安排陵台、乳台、石像生、神门，但有上官、下宫、享殿等。随着陵寝数量的增加，陵区面积扩大了，内外禁山达数千亩。满山松树，郁郁葱葱，肃穆幽深，初具皇家建筑规模，气势非凡。当时，负责管理宋六陵攒官的总护使地位很高，或为宰辅，或是由身为大臣的皇亲国戚担任。宋六陵攒官陵区还设有副使、攒官修奉使、桥道顿递使、殿前都指挥使、都监、巡检等职位，护陵卫最多时在千人以上。经过一百余年，绍兴宝山已经形成庞大的陵墓群，成为江南最大的皇家陵区。

皇家陵区形成后，祭祀活动随之展开。宋六陵的祭祀自孟后攒殡于宝山就开始了，随着历代宋皇驾崩入葬，陵位渐增，祭祀活动也愈发频繁。在当时，凡遇陵主生日和忌日，以及每月朔望、每年四时八节，都会举行祭祀。像朝陵这种重大的祭祀活动，皇帝会亲自到此祭拜。有时朝廷还会派遣官员朝祭，或是地方守臣朝谒，凡到绍兴任职的官员也须首朝陵庙。宗室在清明和冬至会举行祭陵，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风俗。

帝皇陵寝之地，是皇室宗族的根系命脉所在，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南宋皇陵形成后，更显绍兴地位之重要。南宋朝廷为便于送葬、祭祀，专门修建了一条从绍兴城通往陵园的水上道路，大型船只可直达陵园近埠。该通道从绍兴城至东湖一段借助原浙东运河航道，而自东湖董家堰地段起南折至陵园前近埠段，为当时专事陵园水道而扩建，被称为御河。御河终端的村落因陵园建造攒官而得名“攒官村”，御河上的石桥均被定名为陵桥。经调查，入陵的桥梁原有五座，从北到南分别是通陵、拱陵、延陵、进陵、通陵。北向第一座原位于御河与浙东运河相接点西侧50米处（今东湖风景区东入口东湖大桥稍西的位置），此桥后来被拆除了，带有刻字“通陵桥”的栏板也被移到御河与浙东运河相接点北侧的一座小桥上，该处为今人称作“孝仙亭”。御河终点，今留有河埠头（攒官埠）旧址与通陵桥旧址。攒官埠也是进入南宋皇陵水路与旱路的节点，按当地对水道形制的习惯称呼，此处实为一段湊底，即河道延伸至此成为终点。宋室定都临安后，皇家前往宋六陵祭祀的线路以水路为主，具体路线为：德寿宫→新开门→跨浦桥→西兴→觉苑寺→白鹤桥→浙东运河古纤道（钱清—柯桥）→迎恩门→光相寺→都泗门→鉴湖→通陵桥→御河→攒官村→神道→宋六陵。

当时，官员、宫人、车马、舟船前往攒官朝陵的阵仗很大，宋六陵祭典成为皇家祭祖最重要的活动。宋吴自牧《梦粱录》“禁中（于清明）前五日，发宫人车马往绍兴攒官朝陵”，记录的就是当时皇家祭祀的场面，这样的祭典进行了一百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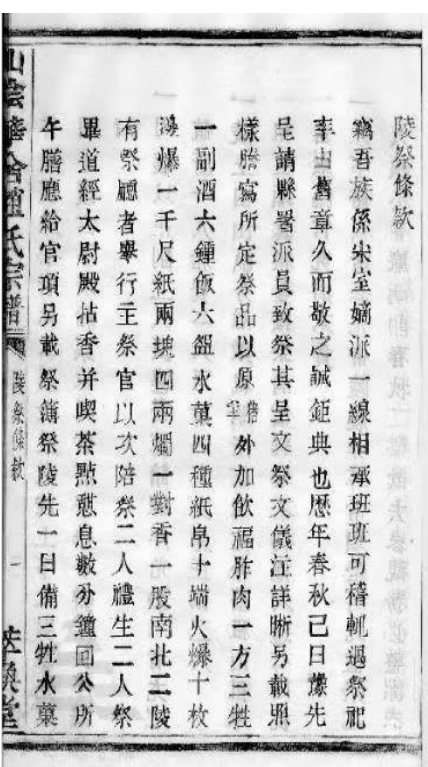
元朝统治者最初对宋六陵实施了保护性举措，曾“张示上榜，禁约诸人，不得侵损宋室山陵”，守陵者仍然住在陵区的陵卫署。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勾结宰相桑哥，盗掘宋六陵及其陪葬墓，得珍宝无数，致南宋陵园毁于一旦。杨琏真伽对宋六陵的破坏是毁灭性的，陵寝的地面及地下建筑被毁不少，守陵者也被驱逐了，宋六陵的全部祭祀活动被迫中断。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非常同情赵宋皇陵的不幸遭遇，曰：“宋南渡诸君无大失德，与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并取之，何乃复纵奸人肆酷如此耶！”（《殊域周咨录》）。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诏将流落北方的宋理宗头骨归葬，礼部尚书崔亮奉敕迁葬宋陵遗骸于攒官，上封松树，重立诸帝陵名碑。洪武九年（1376），明廷下诏陵区五百步以内禁止樵采，

又设陵户二人，令有司督近陵之人看守，每三年一传制，遣道士赍香帛制祭于孝理二陵。凡遇新皇登极，遣官祭告。明代后期，因官山无守者，乃割禁山一半为民业，令居民守之，绍兴华舍赵氏作为宋室嫡裔开始管理宋六陵，官方管理由此转为民间管理。

1644年，明亡清立，清朝延续对历朝皇陵的管理和祭祀。雍正七年（1729），清廷谕令地方官于宋高宗以下六陵严加防护，春秋致祭，且为宋陵添设陵户，每月给食银，祭祀给祭银。清代中后期，宋六陵的维修和管理理由“国管”转向民间管理，主要由绍兴华舍赵氏一族负责，因为华舍赵氏是当时较大的宋裔聚居族群。宋六陵产业在明朝后期已为绍兴华舍赵氏所有，有山三千六百七十七亩，田三百四十八亩，且免交租税。华舍赵氏家谱有载：“窃惟攒官六陵，我赵氏祖宋代之陵寝也。自有明春秋享祀，陵山悉以鬻租。至本朝仰沐皇恩，永远勿替。”“华舍赵氏为宋室嫡裔，食毛践土，二百数十年矣。宋代六陵载在祀典，徐山沿有明旧制，豁粮恩泽，至优极渥”。

华舍赵氏一直在宋六陵举行祭典，殷勤备至。春秋两次祭陵，岁岁不绝。虽不如宋朝皇家祭祀的排场，但也是毕恭毕敬，不同凡响。《山阴华舍赵氏宗谱》中有《陵祭条款》《祭礼仪注》，对祭陵情况载录甚详。据赵氏宗谱记载，先帝陵寝非寻常坟冢可比，值祭裔孙必须公正廉明，春秋二祭意欲参观者，务必整洁衣衫。凡品行卑鄙为乡里所不齿者，不得参与。祭陵者多乘船前往，按规定，族长、宗子、经理、执事各一只，其余执事、调查合乘一只。陵上田山所收茶租、山租、米租三项，由正、副司帐按祭收取。另置值厨一人、给发一人、司胙一人、支应正副二人。祭陵前一日，备三牲、水果、香烛、纸爆，至唐林义士祠、上下太尉殿以及各散陵主祭。是日，六陵公所内灶头中堂应备祭菜各一桌。春秋巳日开祭，绍兴府也会派员（民国时由绍兴县知事）致祭。祭品以原猪、原羊，外加炊福猪肉一方、三牲一副、酒六钟、饭六碗、水果四种、纸帛十端、火爆十枚、边爆一千、尺纸两块、四两烛一对、香一股。在南北二陵祭厅按祭礼举行初献、亚献、三献礼，主祭官一人、陪祭二人、礼生二人。南陵祭高、孝、光、宁四帝，北陵祭理、度二帝。祭毕，再至太尉殿拈香，吃茶点，憩息数刻后回六陵公所进午膳。华舍赵氏在宋六陵举行祭典前，会向官府呈送稟单，稟告祭典时日，并请绍兴府派官员致祭。据华舍赵氏老辈人回忆，最后一次在宋六陵举行的正规祭典是1929年的春祭。30年代后，社会动荡，时局不稳，宋六陵祭祀活动便停止了。后来，陵区又遭大规模损坏，大量碑石和建筑物被毁，仅存几簇古松。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人民群众尊崇敬祖、寻根问祖的意识增强了，政府部门对文物的保护也加强了，宋六陵先后被列为县、省、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赵氏族人，特别是赵宋皇室后裔（单绍兴全市就有10万赵氏族人）对宋六陵非常关注。他们自发前往宋六陵探访祭拜，只可惜皇家陵园里的原建筑物没有了，只能对着“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宋六陵”的牌子，插上几支香祭拜。

进入21世纪，绍兴赵氏族人希望在宋六

陵举行祭祀活动的愿望愈发强烈。2018年，绍兴赵氏中的有识之士成立了绍兴市赵氏文化研究会，开展赵宋文化和宋六陵祭典的研究。2018年10月26日（戊戌年九月十八），由绍兴市赵氏文化研究会组织，在宋六陵北陵区立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碑石的一片古松林前，举行了中断近九十年的宋六陵祭祀典礼，来自北京、福建、上海以及省内的赵氏宗亲共计200余人参加了祭典。

重新恢复的宋六陵祭典按照宋代皇室礼制和华舍赵氏流传下来的祭陵仪程举行，祭品有少牢一副，即全猪、全羊；小三牲一副，即雄鸡、鲢鱼、元宝硬肋；鲜果四盘，每盘堆成方斗状或宝塔状；干果四盘，糕点五盘，五谷五盘。礼器五供：香炉一只，烛台一副，花瓶一对。再备酒杯九只，六只为主神前供酒，三只为三献上酒，茶杯三只，帛礼若干，祭品用红纸或红丝绵装饰。

由于宋六陵区无赵宋皇帝的碑石和祭台，所以须临时搭建祭台。祭品被依次摆放在祭台上，另增主食五碗、菜饭一碗、年糕一碗、面一碗、豆干一碗、馒头一碗。祭礼典礼巨大的背景墙上有赵宋十八代皇帝画像。祭台上放了一排神主，中为始祖，即太祖太宗，两侧依昭穆位排放。配有金鼓乐器，鼓在神主位左，锣在神主位右，金鼓相对。祭品、神位安放好后排执事位，祝官在左，赞官在右，祝官就是读祝文的，赞官是司仪，其他执事随赞祝两官相对而立，司帛在左，司巾在左，司香在左，司卜在右，司酒在右，司饌在右。司衣在司衣所（临时）为主祭，亚献，终献更衣。此次祭陵，主祭陪祭的服式用宋制衣冠，中穿白罗中单，外罩绛纱袍，蔽膝随裳色，头戴五梁冠，手执笏。

祭典举行三献礼，主祭（初献）于神案跪中，亚献在左，终献在右，其余参祭人员立队跪于后方，赞官立在左，祝官立于右，赧祝执圭立于神座前。执事击鼓三通，鸣金十三点，起乐，序班位。主祭者就位，与祭者就位，全体族人向祖先像和祖先牌位鞠躬，拜兴，再拜兴，三拜兴，平身。主祭、亚献、终献诣盥洗所（临时），净手盥洗，授巾，拭巾，拂巾，复位。又全体鞠躬，拜兴，再拜兴，平身。接着祝唱，行降神礼，主祭陪祭诣香案前，跪上香，初上香，亚上香，三上香，止乐。初献后读祭文，然后亚献，最后三献。祭典结束后，牌位、神像焚于祭棚前，分食祭品中果食，分胙肉，祭典程序完成。

2019年9月，绍兴市赵氏文化研究会主持主导申报的“绍兴赵氏宋六陵祭典”民俗类非遗项目被列入绍兴市越城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绍兴市赵氏文化研究会赵铁彪会长被认定为“绍兴赵氏宋六陵祭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宋六陵祭典历史悠久，它蕴涵着深邃的文化遗产精华，重启宋六陵祭典并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意义非凡。

自2018年重启宋六陵祭典以来，绍兴赵氏每年都会去宋六陵祭祀，或隆重或简约，宋六陵祭典得以延续。2020年10月举行的宋六陵祭典规模较大，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位赵氏宗亲参加了祭典。他们先举行谒陵迎神仪式，数百人的谒陵队伍齐集于北陵区的茶厂入口处，迎神仪仗队依序排列，近百人身着宋服，手擎大纛旗，以铜锣开道，彩旗、灯笼、幡、乐队等一应俱全。谒陵使引领宗室后裔，手托太祖、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神位木主，前有香案，后跟宝盖伞，最后是压道旗，巡行谒陵队伍在碧绿的茶地中如一条绚丽的彩带，非常耀眼。一行人巡至孝宗永阜陵前，将七座神主、罗伞、香盘按昭穆列于陵前，随即面朝大众。谒陵使负责上香，率领谒陵队伍四番拜兴，之后便是长跪，由谒陵使唱诵迎请文疏，恭请十八朝先皇风马云车，圣驾降附神主。迎来神主后，谒陵队伍回到位于北陵区的原绍兴师专旧址的祭祀大典会场。时钟鼓齐鸣，七位奉安使率领大众跪迎圣驾。谒陵使与奉安使对拜之后，将七座神主交给奉安使，奉安使将神主捧入新制作的暖阁安座。

绍兴师专旧址操场正中搭有祭台，坐北朝南，立有三座暖阁，中间大暖阁放置谒陵队伍接入的宋室历代帝后神主牌位，宋六陵守陵官郭太尉、唐林两义士、南宋死难将士神位放置在两侧小暖阁中（因为宋六陵原享殿等祭祀场所已无，特制暖阁代之），右边立铜钟，左边置大鼓，整个场地全部铺上红地毯，巨大的背景墙上书“绍祚中兴”四个大字，祭典场地庄严肃穆。

一百位参祭人站立在祭台前面，各地参祭的赵氏宗亲在标有某省某地赵氏的指示牌下站立。正式祭祀仪式开始前，有献花篮致敬仪式，各地主要赵氏宗亲都敬献了花

篮。此次祭典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参与，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

祭祀仪式按照古礼进行，主祭者（正献官）身着宋代高品官服，头戴五梁冠，手执笏板，陪祭者身穿穿官服，着宋代金银盃甲的“镇殿将军”守立于暖阁两旁，击鼓敲钟、引导传送祭品的执事人员和乐队都穿着圆领宋便服，祭典现场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在祭典过程中，还有两位乐官在古乐伴奏中唱诵《乾安之曲》迎神，初献唱《大定之曲》，亚献唱《大盛之曲》，终献唱《大德之曲》，送神唱《兴安之曲》，两位乐官的演唱声情并茂。祭祀典礼整个场面十分壮观，祭典仪式既华丽又庄重。

## 宋六陵祭祀大典祭文

维岁在庚子太冲之月时值重阳吉旦，各派裔孙谨以少牢之仪，太羹玄酒之奠，致祭于我大宋历代皇祖宗室臣民之灵。

呜呼！五运推移，艺祖受之周祚；三灵改卜，太宗膺而宋命。祖宗承荷天休，创业维艰。王于有征，爰于将师，破湖湘，平巴蜀，百越俯首，三灵归命，驱万旅之雄师，制八方之余孽；挽五季之衰乱；开百年之鼎盛，尊儒重道；崇礼尚贤。方岳无甘鲜之贡，殿庭碎珠玉之珍。推天下之致公，虽天子不得自专也，列圣相续，至于宣和，征花石而造艮岳，天运应于西北，民怨结于东南。以致汴梁有焚巢之祸，二帝北狩，三宗南渡。

高宗南渡浙水，应天顺民，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启仙源于会稽，建宝历于绍兴。传国祚于大宋，享天年于颐寿。仙鼎已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可藏，暂存攒官之麓，望北定中原，龙驾回洛。列圣相衍，竟成陵阙。

时值五运北倾，北宋失国，巨祸立至，胡僧取财，发陵丘以盗宝；义士埋骨，安玉匣以慰灵。千亩陵园，几成荒冢，冬青以标。终不凋零。

有明之际，中原克复，建帝陵以尊汉统，修岁祀以崇先王。稽玉牒；识王孙。奉之宗庙，守乎祖陵。长松郁郁，香烟袅袅。虽异代而不废，每与官之同祀。延之近世，国多变故，不举则八十余载。

今神州盛世，生民之未有。户有余资，虽歉稔而无饥；道少遗氓，有大疫而不灾；于是敦叙九族，以述睦宗之志；序属三秋，而动荐祖之行。延家乘之记述，考宗法之故事。羹奉太素，饌列海陆之丰；酒具玄香，果供南北之优。烛开瑞花，香成篆字。仰巍巍之德，罄拳拳之心。

伏膺穹厚之眷，荷祖宗之祥，置家国之安宁，保子孙以祚祥，永锡纯嘏，长庆无疆。尚飨！

太祖三十二世孙新星沐手敬撰

2021年秋，绍兴赵氏在绍兴师专原址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祭典，受疫情影响，只有绍兴市域范围内的赵氏宗亲参加了，祭祀仍然按照古制古礼进行。

2022年7月15日，绍兴市文旅局组织全国主流媒体代表、网络达人到绍兴进行品宋韵的采风活动。绍兴赵氏举行了一场宋六陵祭典演礼活动，时间不长，但一切都按赵氏传承下来的祭陵仪程进行。参加祭礼的人员都穿上正规的宋代官服，整整齐齐列队，一起完成祭典各项仪程，祭典既古色又华丽，整个场面十分壮观。这次祭典演礼是绍兴非遗文化项目的一次正式展示，最是宋韵在绍兴，这次祭典演礼活动就是真正的宋韵。宋六陵祭典演礼受到国家级主流媒体的关注，对宣传绍兴优秀历史文化，促进绍兴旅游业的发展有很大作用。

2022年11月13日，农历壬寅年十月二十日，在绍兴富盛镇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宋六陵区，又举行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宋六陵祭典活动。自2018年10月绍兴赵氏恢复中断了近90年宋六陵祭祀典礼以来，每年都会进行祭典活动，宋六陵祭典一直由绍兴市赵氏文化研究会组织进行。浙江省宋韵文化研究传承中心、绍兴市宋文化研究会、绍兴市家谱协会等团体派代表敬献花篮致礼，浙江省宋韵文化研究传承中心负责人特地从杭州赶来参加宋六陵祭典并代表中心献了花篮。

2023年4月，如期举行宋六陵春祭。10月29日举行秋祭，这次秋祭是恢复宋六陵祭祀典礼以来最大的一次祭典活动，有海内外700多位赵氏宗亲和赵宋文史专家学者参祭。

宋六陵祭典自800多年前形成以后，作为一种传统礼仪、一种传统文化理应得到重视，虽然元代（1276-1368）和近代有过中断，但于2018年得以恢复。在更加注重文化传承、倡导“宋韵文化”的当今之时，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文史专家学者和赵氏族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六陵祭典一定要延续下去，而且一定会延续下去。



# 跟着《梅岭课子图》去寻旅百年人文印迹

●俞广平

《梅岭课子图》是中国传统乡村教育文化的代表与精髓。乡村文化不仅是农村居民的精神之源，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的“渔樵耕读”，特别是“读”（学习）这个主题，在书画艺术、木雕、砖雕、石雕、剪纸等方面均有体现。它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之基，源源不断地为中华文明提供精神营养，使中华文明以独有的方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深厚的历史、社会与教育意义。《梅岭课子图》后跋有多位名人手书原迹，比如俞樾、谭献、蔡元培、吴昌硕等，这种诗文书画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承载着诸暨乃至浙江先贤“课子”与“孝亲”的事迹，它是人们追寻先人足迹，感悟先人理念，研究先人思想最直接、最生动和最珍贵的文学艺术教材。《梅岭课子图》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意义与价值，也具有相当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其中所载诗文大多不见于其他文献，可补相关名人文献专题之缺。本文将作简要的阐述。

《梅岭课子图》以画、书（跋）并举的方式，讲述了诸暨南乡梅岭（今暨南街道新胜村荷香畈）傅家父子读书明理、立身兴家的故事，展现了傅氏孝亲爱悌，尤重家学的文化情结。

《梅岭课子图》真迹（含题辞）原有三段，分三轴装裱，其中两轴现藏于诸暨市档案馆，被评定为“浙江省档案文献遗产”、国家二级文物。该图乃晚清诸暨籍文化名人傅晓渊请画家胡琴舫所作，画面主体部分是晓渊之父傅岱在家乡梅岭“结庐授课”的场景。画成后，傅晓渊的老师、晚清著名文学家、经学大师俞樾题书“梅岭课子图”，并撰文具体介绍傅父课子的情况，此后又有多位名人学士在画轴后题辞，从而形成清末民初七十多位文化名人手书题辞在一画之上的文化盛举，使《梅岭课子图》成为集图画、书法、诗词、歌赋于一体的书画艺术长卷。

## 像 遺 生 先 淵 曉 傅



傅晓渊像  
光绪十六年（1890）暮春三月的一个晚上，春雨绵绵，在浙江中南部的宣平县官署，一位名叫傅晓渊的官员与他的好友胡寅再次相见。胡寅是台州温岭人，出身店员，书画自学成才，后寓居温州永嘉，是当时浙南有名气的书画名家，两人一番寒暄之后，傅晓渊拿出其父傅江峰的遗作给胡寅欣赏，并在灯下叙情话旧。期间，傅晓渊说起当年在家乡梅岭（晚清时的梅岭，泛指今诸暨暨南街道新华村梅岭自然村、新胜村荷香畈自然村一带）时，父亲傅江峰对他们兄弟二人的谆谆教诲，无限感慨……胡寅听完非常感动，他答应傅晓渊把这个庭训双雏、亲子督课的感人场景用笔墨描绘下来，并题诗两首，这便是《梅岭课子图》中“本图部分”的来历。



《梅岭课子图》（本图部分）  
傅晓渊在江浙两地为官三十多年，一生以父亲为榜样，敦品积学，清正廉明，素有“傅青天”之称，后兼以教授学生为辅业。在这三十多年里，他辗转江浙沪各地，将胡寅所作的《梅岭课子图》随时带在身边，并在画轴后面的空白部分，遍征题咏。自光绪十六年（1890）至民国十一年（1922），先后有七十多位名士为《梅岭课子图》亲笔题辞，或传或序，或诗或文，篆隶真草，各体兼备，这便是《梅岭课子图》的“题辞部分”。傅晓渊晚年亲自整理这些文辞，编得《梅岭课子图题辞》七卷，并把《梅岭课子图》本图、线刻图及题辞分裱成三个长卷轴。

如果说《梅岭课子图》中的“图”是引玉之砖，那么图后的“辞”则犹如群玉琳琅之馨，激荡出文化名人之间的交往逸事与人情世故，历史的回响在笔墨之间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俞樾像  
光绪十八年（1892）暮春一日，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杭州三台山下的右台仙馆，72岁的俞樾（曲园）坐在桌后的藤椅上，他接过学生傅晓渊手书的《梅岭课子图》，摊在桌上，徐徐展开，近距离欣赏一番后，不由地赞叹笔墨之精妙，题材之合宜，他为学生的孝行所感动，欣然题写“梅岭课子图”五个开轴大字，并为傅晓渊所作的《先江峰府君行述》填讳。八年后，80岁的俞曲园在苏州再次为学生题写“守梅山房”四字。

## 圖 子 課 嶺 梅

1892年春，俞樾题写“梅岭课子图”开轴大字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梅岭课子图”一块竖额老石碑镶嵌于傅氏宗祠中厅后墙；“梅岭课子图”“守梅山房”二块横额老石碑，则镶嵌在傅晓渊故居（太和堂）前廊墙上。



翻开傅晓渊所著的《守梅山房诗稿》，《荷香畈双碑》一诗（附注）记其事：双溪既名庄（徐花农侍郎书双溪庄记），太和亦颜堂（蒋季和太史书太和堂额）；更有经师笔，摹镌石两方（曲园师壬辰季春右台仙馆书“梅岭课子图”额，光绪庚子冬，在吴下书“守梅山房”额，大字隶书俱径一尺，小字行书俱径一寸，碑长二尺，阔四尺，厚一寸八分）。梅岭昔课子，趋庭未能忘；绘图复题额，壬辰三月长。至今开卷读，神往右台旁；荷畈梅岭迁，守梅旧山房。命名未有额，夫子始闡扬；因之坊宅志，补入龙泉乡。两额俱汉隶，双碑嵌前廊；他年录金石，吾庐有辉光。

今天，我们仍能够把石碑原物和文献记载两相对照，由此可见，傅晓渊的“记录意识”“档案意识”穿越了百年，这三块百年碑刻文物，用最坚固的方式承载着俞、傅之间的师生情谊，让人不禁想起“岁月失语，惟石能言”这句话。

俞曲园对诸暨籍学子似乎有着特别的亲近感，除傅晓渊外，同时期的诸暨人陈伟、陈通

声、蔡启盛（蔡叔厚之父）、吴忠怀等人均为其得意门生。这其中，俞曲园曾亲书“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赠与蔡启盛。

目前，虽无史料能够证明俞曲园来过诸暨，但位于诸暨暨浦镇宝掌山大岩寺岩壁中的俞氏藏书洞，则说明俞曲园对诸暨的山水人文是十分认可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俞曲园在傅晓渊、张善友（字子厚，云南昆明人，曾任诸暨知事）、吴忠怀、蔡启盛等弟子的建议下，决定将自己所著的160多册书籍存藏于诸暨，并委托傅晓渊全程运送；傅晓渊与吴忠怀等商议后，最终选定在梅岭东北方12公里外的宝掌山大岩寺岩壁凿洞藏书，俞氏藏书洞距地约10米许，通风、避阳、干燥，符合书籍长期保存的条件。关于藏书的经过，傅晓渊还专门作《宝掌山曲园师藏书诗》，以诗叙事，记录始末。

尝披一统志，宝掌禅师辟；伽乌树贝多，千岁著灵迹。光绪乙巳冬，为藏曲园集；曲园本吾师，精舍主讲席。十载老门生，吴门重亲炙；为言同治初，中外崇儒术。太息新学来，诂经俟非昔；尼山俎豆祀，薪火传将绝。幸有汉诸生，秦燔谋鲁壁；孤山首藏书，鹤守推徐辟（花农侍郎）。毛茔（子云茂才）实继之，右台储以铁；张侯宰暨年（邑侯张雅厚同门善友），小试栽培绩。公暇召同门，名山营石室；时余刺婺东，迎母适回浙。吾师春在堂，命作寄书客；文孙（阶青太史）为束装，一百六十册。抵暨授贤侯，吴雄（澄夫广文）拒制粟；鸠工架飞梯，凿破惊天石。既将青峰开，仍遣白云暮；风雨不敢侵，山灵为护惜。所忠求何时，不准发何日；安得董江都，遥遥年五百（结用春在堂诗意）。

俞曲园本人也作宝掌山藏书诗记。记云：门下士诸暨令张子厚，吴澄夫广文，傅晓渊大令，为余凿书藏余其邑之宝掌山，成以诗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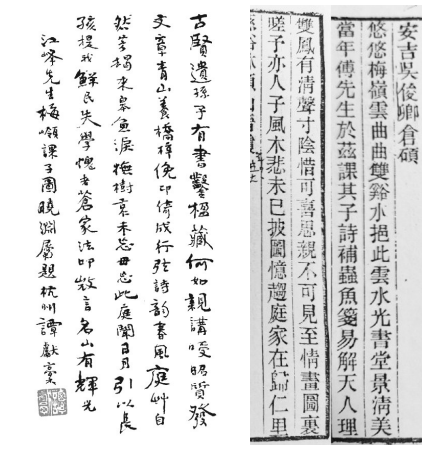
诗云：  
辛苦穷经册载余，自怜无益费居诸；未忘叠帚千金意，聊付名山二百储。敢望所忠求祥稿，倘逢不准发藏书；悠悠五百余年后，毕竟谁为董仲舒？五泄云山深复深，欣逢仙史此鸣琴；地从宝掌禅师辟，碑向香岩佛寺寻。白氏拒将文集贮，乌曹砖免土花侵；区区妄作千秋想，费尽门墙诸子心。天下甲子几来时，世运茫茫未可推；已分百年批荏苒，还劳两处刷崔嵬。余芳远绍芸香业，小慧兼存柳絮才；愿仿石经堂旧例，未逢其会莫轻开。

可惜事与愿违，俞氏藏书洞“遥遥悠悠的五百年”没等到，仅过五十年（1955年）便被人打开。为了更好地保存俞氏古籍，相关部门把这批藏书转回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永久保存。这些书从俞楼出发，最终回到俞楼邻近的省图孤山馆舍。五十年间，从孤山到宝掌山，从西湖到浣江，兜了个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藏书洞就此废弃，洞口封石壁上（上刻“俞樾门下士诸暨知事云南张善友题记”）则被移置到枫桥小天竺景区碑廊，书去石留，任人凭吊感怀。

此外在小天竺景区碑廊，还有俞樾、吴昌硕（俊卿）、韩培森、王继香、王同、孙廷翰等六人题写的“梅岭”字样石匾两方，俞樾为傅晓渊写的“景义轩”“学陆斋”石匾各一方，这些石匾系1985年前后，小天竺景区工作人员从太和堂及村口的一座古凉亭内征得，见证了百年前师生、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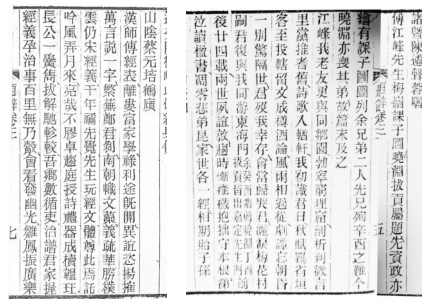


在《梅岭课子图》众多撰跋书文的人物中，有至今为人熟知的名家硕儒，如晚清文学家、藏书家谭献，西冷印社首任社长、海派书画艺术宗师吴昌硕，民国浙江都督、交通总长汤寿潜，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教育家蔡元培等，再如诸暨的地方名家：陈通声、蒋智由、吴忠怀等，不少市民也略知一二。



安吉吳俊卿翁頌  
悠悠梅嶺雲曲雙鈴水抱此雲水光書堂景清美  
當年傅先生於茲課其子詩補蠱魚獨易解天人理  
變風有清聲寸陰惜可善思親不可見至情畫圖裏  
壁子亦人子風木悲未已披閱憶庭家在歸仁里  
江峰先生梅嶺課子圖晚清題杭州譚獻書  
譚獻書跋原迹  
吳昌碩（俊卿）書跋原迹  
先鴻梅嶺課子圖跋題勉應四行即勝  
仙霞石臂公來白蟠入迂倪尺幅間補種階前書  
帶草教人錯認不其山  
萬梅花散屋三楹花下徐二領鶴門底事鄉翁  
管案月課兒原不為和夢  
花春那足抵書香離禽清散噪上聲一世春風恨  
藉甚好環繞肯錄冰霜  
頗聞收盤上天飛獵兔桃源此處幾欲買無錢  
遜亞商童添墨蘭吟屋  
光緒二十二年冬并同府山陰湯壽潛

汤寿潜题诗原迹  
也有些人几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通过查找诸暨本地方志和家谱等档案资料，便可探知他们的个人简历及其与傅晓渊的关系，人物形象也立刻变得丰满起来，郦琮和钟煥就属于此种类型。



蔡元培书跋原迹  
陈通声书跋原迹  
郭肇为《梅岭课子图》撰序，郦琮以隶书体书文  
郦琮（1843-1918），谱名猷猷，又名晓佳，字方之，学名琮，邑庠生，诸暨江山人。《诸暨诗存》主编郦滋德次子。郦琮自幼深受父亲影响，博学多才，精诗词文义，善书法，热心公益，系诸暨地方名士。郦琮亦为傅晓渊好友，1918年11月，郦琮逝世后，傅晓渊连撰挽诗七首，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因此《梅岭课子图》中出现郦琮书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家学源流一老果于晚才不让人先  
原能起底会笑名世於今有象賢  
猶托牙仙伯領事春風才子只冷  
百年好句堪持贈瘦到孫枝又一班  
遠近皆知百十年來未改舊時風  
鍾煥先生題  
先尊翁江峰先生梅嶺課子圖錄情  
先緒丙申五下月自來陸陸要宮拜草  
中伏日後學鍾煥敬書

伍燮寅为《梅岭课子图》撰跋，钟煥书文  
钟煥（1850-?），幼名思煥，字仲哲，号且安，邑附生，光绪元年（1875）乙亥科试入学，诸暨城区人。钟煥系清代诸暨籍书法篆刻名家钟叔权次子，农夫山泉老总钟映的高伯祖。他幼承家学，及长，善书法篆刻金石之学。钟煥与郦琮系好友，钟煥在《梅岭课子图》中替伍燮寅书文，系郦琮的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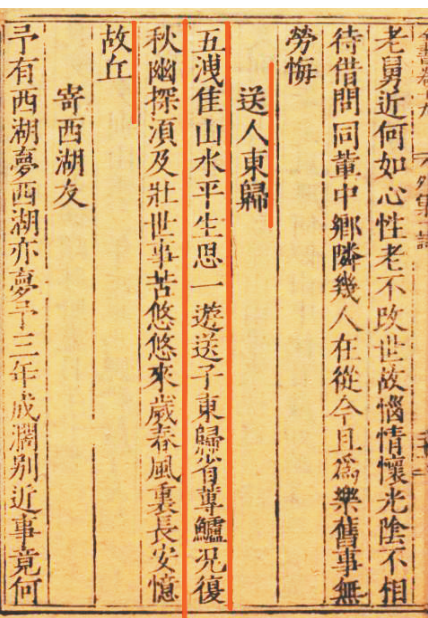


# 王阳明家族与诸暨渊源考

●赵岳阳

(接第146期第8版)

阳明诸暨渊源深



明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送人东归》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王华长子。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明穆宗追赠新建侯，谥“文成”。创“阳明心学”，影响深远。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获予从祀孔庙，诸暨县学大成殿立“王子守仁”牌位以奉祀之，自此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子并为儒家“四圣”。赵友钦在五洩对王纲所说的“公后当有名世者矣”，在王阳明身上达到极致。

王阳明因六世祖王纲隐居诸暨五洩，对五洩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在弘治十八年（1505）王阳明任职兵部时所作《送人东归》诗中表露无遗：“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游。送子东归省，莼鲈况复秋。幽探须及壮，世事苦悠悠。来岁春风里，长安忆故丘。”此诗未明确究竟送给何人，是时生还是故旧？但此人在秋风起，木叶飞的时节起“莼鲈之思”，从京师回诸暨省亲，或邀请王阳明同作五洩之游，应无疑义，甚至是居住在五洩山的王氏族人亦不无可能。虽是赠人之作，但全诗表达了时年34岁的王阳明对五洩佳山水的无限向往，因世事牵绊不能到访，来年的春天也只能在京城思念“故丘”的遗憾。“故丘”有两义，一指故乡，五洩作为王纲隐居的所在，在王阳明心目中是“故乡”一般的存在，亦如此后王阳明祭王纲时感叹的“从此增城是故林”；一指祖坟，是因为王纲母亲朱氏卒葬五洩而引起王阳明“来岁春风里”的怀思？有待详考。

王阳明幼年来过父亲任教的诸暨枫桥，后居绍兴府城，与枫桥相距不远，你来我往自是不免。当得知年伯骆琬（字蕴良）要到六世祖王纲曾经出仕的潮州任知府时，特作《送骆蕴良潮州太守序》相赠。据浙江按察司副使赵宽《江西副使骆蕴良先生墓志铭》载：“弘治丙辰（1496），擢知广东潮州府。”可知王阳明作此文时年方25岁。“诸暨骆公蕴良以左府经历擢是任……余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无足为赠者，为潮民庆之以酒，而颂之以此言。”王阳明面对父执毫不拘谨，可见两家交情之深厚。光绪《诸暨县志》称：“（骆琬）升江西副使乞假归省，遽歿于家。王守仁、赵宽闻之，俱以琬年始五十，未竟设施，为之惋惜。”

嘉靖十三年（1534）枫桥骆氏建园林于紫薇山麓，名“小天竺”，碑廊今存《王阳明立诚之说帖石》一通，该石原嵌于见大亭。其文曰：“立诚之说，昔已反覆，余不复赘。别后诸君欲五日一会，寻丽泽之益，此意甚好，此便是不忘鄙人之盛心。但会时亦须略定程，论辨疑难之外不得辄说闲话，议评他人长短得失，并及诸无益事。只收心静坐，闲邪存诚，此是端本澄源，为学第一义。若持循涵养得熟，各随分限，自当有进矣。正德丙子九月廿九日，阳明山人守仁书于龙江舟次。”末铃



枫桥小天竺《王阳明立诚之说帖石》

“守仁”印。此是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将巡抚南赣汀漳，临行与同好集会，在龙江船上所写“论聚会规程”的信，骆氏子弟将其刻石，奉为主臬。今人钱明在《〈王阳明全集〉未刊佚文汇编考释》予以收录，题作《龙江舟次书》。其文末尚有“会时但粗饭菜羹，不得盛具肴品为酒食之费。此亦累心损志之一端，不可以为琐屑而忽之也。舟发匆匆，不尽不尽。”可见骆氏在镌刻时作了取舍。帖石所刻“立诚之说”“闲邪存诚”是“致良知”的根本，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主要内容的“阳明心学”在枫桥学人的推波助澜下，传承不息，成为“枫桥经验”的精神根脉。

阳明心学传诸暨

嘉靖二年（1523），王阳明弟子、绍兴知府南大吉，考选绍兴府八县优秀生员，升入重修の稽山书院，请王阳明督教讲习。加之后来所建阳明书院，吸引了天下士子前来听讲，一时盛况空前。据钱德洪《阳明年谱》载：“官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来自诸暨的弟子亦在其中，由于史料缺乏，现可考者除郑天鹏、翁溥、骆骥以外，还有时任诸暨知县朱廷立等人。之后，阳明弟子尹一仁来诸暨任县学教谕，钱德洪来诸暨任紫山书院掌教，他们在诸暨宣讲阳明心学，培养再传弟子，为阳明心学在诸暨的传播，提供了新生力量。

郑天鹏（1474—1556）字子冲，号南溟，诸暨枫桥人，从王阳明游，秀出等夷。正德癸酉（1513）举人，官弋阳县知县。强直不肯居人下，见同门翁溥、骆骥考中进士，感叹：“吾不能为乡里后生作长解也”。善书法，“谕示”有手书者，辄窃去，复书之，又失，至再三书，不以为忤。不满考即辞归。日研究诗文、摹碑版。家贫不自给，不以介意。年八十余，还能于灯下作蝇头细字。著有《南溟集》《蓬莱亭集》《闽游唱和集》《北行野操》《秉烛正讹》等。

骆骥（1497—1533），字汝良，号楮山，诸暨枫桥人。嘉靖壬辰（1532）进士，官刑部主事。从祖父骆琬从潮州归，一见器之，对其父凤岐说：“诸子英立，然迈种亢宗者，骥也。”及长，受业于王阳明之门。及廷对，侃侃万言，人以为可与董仲舒相比。应诏言事大略，谓“致中和，则天地位，万物育。中和未致，灾异所以频仍也。”奏疏中有涉及大学士张孚敬者，张孚敬不识骆骥，入朝私下询问谁是骆骥，及见，为之悚然，且曰：“吾目中素空无人，及睹骆名心动，今果为所中。”一时风采节概，震动朝右。惜年37而卒，未尽其才。



陈洪绶作 王阳明像

翁溥（1502—1557），字德宏，号梦山，诸暨紫岩乡（今属店口镇）人，为王阳明弟子。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谥“荣靖”。深得心学精髓，认为“善观民者观诸我；善观我者观诸民。盖民风也，我风之自也。知风之自，而理道得矣。”著《知白堂稿》。嘉靖十六年（1537），时任江西巡抚的翁溥看到赣州通天岩阳明先生题诗，即作《奉和阳明先师韵》：“朝来风雨过，真寂洞崖好。晴霞带白云，游历凌三岛。緬彼飞鸢人，步虚何太早。洞口空复春，花落无人扫。”他与罗洪先、沈炼、孙应奎等阳明弟子相交甚密。罗洪先（1504—1564），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己丑科状元，作有《与同年翁德宏观风亭话旧》诗。沈炼（1507—1557），会稽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作有《送翁梦山拊循四川》诗。孙应奎（1504—1586），余姚人，嘉靖八年己丑科（1529）进士，为撰《南京刑部尚书谥荣靖翁公溥行状》。

朱廷立（1492—1566），字子礼，一字两崖，湖北通山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著《盐志》《马政志》《家礼节要》《两崖集》等。初任诸暨知县，屡次赴绍兴向王阳明请教。问政，王阳明与他谈学，通过省察自身，了解百姓好恶。他作《讼诫》以勒于石，并置鼓于狱，囚犯如有所苦，可击鼓以闻。额外杂税，为蠲除之。爱民礼士，勤于职守，果然“三月而政举”。问学，王阳明与他谈政，以百姓趋避，而修其身。他罢修海塘，挖池蓄水以备灌溉；加固湖堤以防洪水。建“观稼亭”以观岁之丰歉，“期年而化行”。又问政与学之要。王阳明答以：“明德、亲民，一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而止于至善，其要矣。”朱廷立退而见其良知，曰：“吾乃今知学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王阳明通过循循善诱的教导，把治学修身与亲民理政结合起来，步步深入，不断启发，让阳明心学通过朱廷立身体力行的实践，在诸暨作了一次成功的尝试。朱廷立以实践验证了阳明心学的有效性、实用性，而且认识到学可以为政，政可以为学，体会到“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领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阳明学核心。嘉靖六年（1527），朱廷立诸暨任满，郑天鹏作《御史吟·送邑令朱两崖被召》相赠，词曰：“朱夫子，何行行？天书远召趋神京。慈母之去民欲哭，吾独喜去为凤鸣。百里封疆何足惜？为凤鸣，天下平。”民受其泽，尊为慈母。事实证明，诸暨是阳明心学较早“落地”并得到验证的“示范基地”，尤其是得到阳明先生的首肯，特作《书朱子礼卷》以广而告之，因而更具有非凡的意义。

尹一仁，字任之，号湖山，江西安福人。王阳明巡抚南赣，尹一仁投其门下，学问大进。嘉靖七年（1528）举人。十一年（1532）署诸暨学谕。初至，教以“致知求观本体”，诸生哗然。之后，诸生见尹一仁事事能反躬约己，取予辞受都依圣人经典，始从其学。十四年（1535），紫山书院初成，一仁为诸生制定科目及条例，作止、进退、坐卧、歌咏，皆有节次。院有“求放心堂”，一仁作《求放心说》以谕诸生曰：“至诚不放者，心之体，动而后有放，放而求之者，善反之功也……是故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之道无他，致知而已矣。致知者，致吾心知放、知不放之实而毋自欺也。于哉！致知之义大矣哉。”一时传为名言。六年后离任，钱德洪撰《湖山先生遗思碑记》，称“先师之学，得湖山授受于暨，以远追珠泗何极也。”官至归德知府。

钱德洪（1496—1574），名宽，以字行，余姚人。嘉靖丙戌（1526）进士，官至刑部郎中。王阳明讲学，德洪从之游，深得良知之旨，学者称绪山先生。嘉靖甲辰乙巳（1544、1545）间，徐履祥任知县，修葺“紫山书院”，聘主讲席。其为教以启悟人心为本，发明阳明之学，竟竞于求放心之说，“心为天地百物之灵，主宰乎天地百物者也。故心存则主宰是，家国天下得其理矣，治之所由出也。”于是诸生皆知诵法讲师，求其心而不敢放。嘉靖二十四年（1545），撰《诸暨县庙学告成记》。嘉靖丙寅（1566）为门生黄玺之父作《黄石田墓志铭》。隆庆四年（1570）撰《诸暨县修建庙学记》。此外，尚著有《绪山会语》《平濠记》《阳明年谱》等。讲学之余，曾游五洩和宝寿寺，与门生徐履祥、郦琥以诗唱和，其诗刻于第五洩、涵澈峰等处，今保存完好。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山阴县（今绍兴）人。嘉靖十三年（1534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主事。受业于王阳明，后协助指导学生，有“教授师”之称，与钱德洪并为王阳明最赏识的弟子。罢官后，来往江、浙、闽、越等地讲学四十余年，所到之处，听者云集。有《王龙溪先生全集》。嘉靖二十四年（1545），王畿亲自撰写《暨阳教谕尹先生遗思碑记》，“先生既入冬官，暨阳之士

追思其教弗之忘也，图有以设之。徐生行、郭生从蒙辈，次叙其绩，再拜以请……兵部郎中王畿撰。”嘉靖二十七年（1548），诸暨知县李文麟、王陈策修文庙戟门，王畿为《诸暨县儒学重修文庙戟门记》书丹并篆额，尤可宝贵。

再传弟子及后世

徐履祥，字子旋，长洲（今苏州）人。嘉靖癸巳年（1533）钱德洪为苏州学政，徐履祥从其受阳明之学，为阳明再传弟子。嘉靖二年（1541）进士，次年知诸暨县事，浚湖筑堤人称“徐公堤”。捐修学庙，重修紫山书院，敦聘钱德洪主讲，以教其民，凡民间子弟资质有可进者，皆劝之学，与在学诸生一体，作“养伤馆”，延师授餐备用，如父兄对待子弟，汉文翁之化蜀也不过如此。升南京尚宝司丞，嘉靖三十四年（1555）迁少卿。骆问礼拟列入诸暨名宦祠，不果。

嘉靖二十四年，徐履祥续修《诸暨县志》，并捐资刊刻。光绪《诸暨县志》载：“予自为暨县，念夫志者，治理之谱也。辄取县所存新旧二志览之。旧者辞文，新者事说，殊非推行之关要。乃敢命意删叙，为文五篇，凡八卷，更乙巳（1545）春夏二仲始毕稿，捐俸而刻之。与修县学诸生骆骥、黄玺、郦琥、郭从蒙、寿成学、黄暨、张思得、应思敬、姚德中云。长洲徐履祥子旋谨识。”可知上列诸生皆师从尹一仁或钱德洪，为阳明再传弟子无疑，其他尚有徐行、黄璋等。

骥，字汝先，诸暨枫桥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贡生，官孟津王府教授。黄玺，诸暨璜山（今东白湖中市村）人。恩贡生，南直隶徽州府经历。寿成学，字子行，诸暨墨城坞（今属姚江镇）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科应天中式举人，官南京太平府通判。姚德中，嘉靖三十七年（1558）贡生，官福建延平府教授。

黄暨（1523—1595），字朝献，号近谷。诸暨璜山（今东白湖中市村）人。万历二年（1574）岁贡生，官南京太仓州判官。授从事郎。任上兴利除弊，吏畏民怀，政绩卓著，告退时，民挽留者数以万计，内阁首辅王锡爵手书“清时高尚”额，又赠诗：“白日青天送君行，江湖花鸟不胜情；长安争似山居好，清酒一壶棋一枰。”

郦琥，字仲玉，号玄崖，诸暨县城后街（今属暨阳街道）人。钱德洪弟子，恪守阳明之学。以贡生官绩溪县主簿。汪周潭中丞为题其轩曰“高士”，同邑骆问礼为作《高士轩记》，徐渭为作《和苏集序》，又作《无鱼篇》相赠：“文成一线今将断，钱翁老死寒灰散。十年半夜急传灯，西来衣钵君应管。”谓其得阳明正传。著有《形管遗编》《会仙女志》等。

张思得，字阳山，诸暨花厅（今属暨南街道）人。钱德洪弟子，嘉靖二十九年（1550）贡生，以乡贡分教南康，传阳明之学，邑士竞相磨砺，哀然兴起。巡抚马公、巡按郑东泉交相称赞，督学黄公亦以为贤，聘主白鹿洞书院，与诸生发明致圣之训，令体诸身心以自验得失，改教田间福安，士服其教如在南康。后任南京太和县教谕。

阳明心学在诸暨传承不绝如缕。至清代有蔡英，字蕃宣，号东轩，诸暨街亭岛桥人。乾隆丁酉（1777）举人，官江山训导。撰《俟采副草》，其《读阳明集》云：“阳明大儒，不得诋之为禅学，谓其学不合朱子则可，谓其入于禅学则不可。谓其节目不同朱子则可，谓其本原不合朱子则不可。”折衷至当，不染讲学家习气。张廉（1761—1833），字通源，诸暨牌头水霞张人。道光甲申（1824）岁贡生，刻志经史，著有《士习论》《春秋论》等。晚岁究心阳明之学，著《道学论》，其略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阳明起而任之，穷则效微服之过，达则建伊吕之业，而后人顾以桂尊之邪说，拾颀完成、吕留良之唾余，妄为刺议，岂不惑哉？”《列代史论》论汉宋明学派朋党，皆于士习人心有关系，论阳明之学尤为持平。

当代杨国荣，1957年生，诸暨草塔银河潭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国际哲学学院院士、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王学通论》《心学之思》《杨国荣讲王阳明》《王阳明》等。

结 语

诸暨作为“阳明心学”的“实验基地”曾得到王阳明的亲自认可。此后，阳明心学在诸暨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枫桥小天竺《王阳明立诚之说帖石》镌刻着的“立诚之说”“闲邪存诚”作为阳明心学“致良知”的根本；五洩是王阳明最推崇的先祖王纲奉母隐居地，是体现中国传统忠孝文化的绝佳所在。王纲与王冕、赵友钦、刘伯温等“大咖”在五洩的“因缘际会”，为五洩的山水文化增添了一段色彩斑斓的传奇。